

俗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半个多世纪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近万名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迄今回眸，仿佛历历在目，令人痛心不已！痛定思痛，我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等人无疑是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但这是外因；从内因上说，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项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错再错，给敌人可乘之机，使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得逞。本文试就项英的错误作一客观的分析。

反对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 推行王明俯首称臣的右倾投降路线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长期处于分裂内战状态的中华民族，出现了团结御侮、合作抗日的崭新局面，

试析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国共两党两军顿时由昔日势不两立的敌党敌军变成了今日同赴国难的友党友军。

但是，蒋介石与我党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和反共政策并未因国共再度合作而有所改变。蒋介石甚至当着中共驻武汉首席代表王明之面，毫不隐晦地表示，消灭中共“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甘，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①

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向全党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强调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②，呼吁全党同志“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③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王明从苏联回到了延安。1937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抛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纲领，心甘情愿地充当国民党的附庸和尾巴。会上，毛泽东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是，与会的项英等人竟不辨是非，发言支持王明，反对毛泽东的观点和政策。致使王明得意忘形，并在他后来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肆意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1938年9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告诫王明不要再在党内制造混乱，号召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总结报告，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

○
汤胜利

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经过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终于成为全党的共识，从而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路线上的保证。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与会的项英会后仍旧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以为然。1938年10月31日，他在新四军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以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名义，继续推行王明的那一套，公然强调“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反过来，工作就不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1939年2月，毛泽东特派周恩来千里迢迢赴皖南泾县云岭村，到新四军军部当面做项英的工作。私下交谈中，周恩来要项英放弃错误立场。项英则固执己见，强调所谓“江南特殊论”。他说，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要和蒋介石发生磨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三战区的命令。周恩来对项英将蒋介石的“演说”编进新四军的政治教材、不发动群众、排斥叶挺将军等一系列右倾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并在新四军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蒋介石一心想利用国共合作，限制我党，吃掉我党，我们一定要统一又独立，对蒋抗日的一面要联合，其反共投降的一面要反对，绝对不能一切服从。在周恩来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下，项英勉强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悔改。但是，周恩来一走，项英就立即翻脸食言，拒不认错，而且公开宣称“我们同蒋介石、顾祝同的关系，是婆媳关系，婆婆不让办，媳妇就不能办！”^④由此可见，项英在抗战初期主持皖南新四军工作期间，固执地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切服从”，客观上为蓄意反共的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政治条件。

抵制毛泽东东进北上的韬略 一味坚持偏安江左，伴虎而眠的立场

新四军不是一般的抗日队伍，而是经过国共两党几轮谈判之后，由分散在华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革命劲旅，是我党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血与火考验保留下来的红色火种，身在延安的中共中

央、毛泽东特别重视这支远在大江之南的战略劲旅。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毛泽东及时地为新四军制定了“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具体说就是“向东作战，直逼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⑤这是新四军赖以生存、发展的正确决策。

但是，项英却不以为然，并千方百计在行动上予以抵制。为了革命大局和皖南新四军的前途，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对项英作了大量的工作，而项英一意孤行。这样，云岭和延安之间，从1938年至1941年，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新四军发展方向之争。

新四军组建伊始，毛泽东就致电项英，指示他尽快东进北上。项英以“苏南多平原水网地区，不利发展”为由，拒绝执行。5月14日，毛泽东给项英发了一封长达300多字的电报，以八路军挺进华北平原大显身手的生动事例说服项英，令他尽速率军东进苏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壮大新四军，然后分兵一部渡江北上，向苏北发展，大胆挺进沦陷区。但项英置若罔闻，对国民党深信不疑，以“把军部放在皖南，背靠国民党区域安全”为由，将新四军军部最终还是安顿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并按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担任青弋江防务。顾祝同不准项英越雷池一步，项英也竟然唯唯诺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使外战外行的国民党终于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悍然将政策重心由对外抗日为主转为对内反共为主，并大造反共舆论，叫嚣“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显然，一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

新四军的处境十分不利。周恩来赴皖南时，在叶挺、陈毅、粟裕、张鼎丞等新四军高级将领的支持下，对项英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和批评，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一体现“东进北上”战略方针的新四军具体作战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周恩来还规定了三项具体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新四军就向哪个方向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新四军就到哪个地方创造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伪，友党友军不注意去活动，新四军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然而，周恩来一走，项英就公开宣称：我军在数量上、武器装备上都不具备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条件，即使具备了条件，也不能这样干，干了，国共合作就可能破裂，就不利于抗战。他指责“东进北上”的战略决策是“冒险”、“蛮干”、“乱弹琴”的左倾方针。^⑥不仅如此，项英还利用职权，限制、阻挠那些坚决执行中央“东进北上”战略方针的新四军指战

员。他将正在苏南苦斗的陈毅、粟裕主力西调皖南，把中央派赴云岭支援苏南敌后斗争的长征干部、投笔从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及归国侨胞，全部留在云岭军部。这些举动，不但严重削弱了苏南苏北的抗日斗争，而且使这些党的宝贵财富后来在皖南事变中损失惨重。

为了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纠集了18个团的重兵，横插于苏南、皖南两大新四军主力之间，企图各个击破。鉴于蒋介石已经看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⁷⁷中共中央、毛泽东不知多少次电令项英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但项英就是不听，他断然回答：“新四军必须留皖南，以免三战区怀疑我们同他们合作的诚意。”⁷⁸坚持“皖南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⁷⁹

项英一意孤行，蒋介石又步步进逼，使皖南新四军险象环生。苏北的刘少奇、苏南的陈毅、粟裕等甚感忧虑，纷纷致电中央。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更加焦虑，为了敦促项英尽快转移，他连续召集政治局会议，磋商对策。1940年5月4日，一天之内，便给项英发了两份电报：一份令项英接受陈毅建议，立即东移苏南，再向北发展；一份是长达2700多字的指示电，史称“五·四指示”。该电一方面重申了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同时警告项英，若再不放弃那个所谓的“江南特殊论”，迅速离开皖南，“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⁸⁰，责成以项英为首的东南局、军务会认真讨论，并传达到全体干部，然后坚决执行之。项英接到电报后，一不传达，二不执行，反而回电中央，居然斥责中央来电“系带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傲慢地表示“中央责成我传达，我不能负此责”。⁸¹陈毅闻讯后，立即派人携亲笔函，日夜兼程，飞奔云岭，向项英痛陈利害：伴虎而眠，必将被虎所伤。谁知项英竟说，不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不能转移。陈毅得知后，大声吼道：“项英这样目无中央，赖在国民党划的小圈子里，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说完亲率苏南新四军主力过了江。

陈毅北渡后，皖南新四军处境更趋危险。1940年底，8万“皖南进剿军”已将皖南新四军四面包围，待命出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先执意不走的项英顿时慌了手脚，频频向中央告急。毛泽东接电后，于12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对项英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又告诫他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否则，再

拖下去，“你们是很危险的！”此电拍发后，毛泽东又与朱德在当天联名致电项英本人，提醒项英“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重些”，命令项英“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⁸²拿到电报，项英终于决定离开株守三年的圈定弹丸之地。然而，此时转移已为时过晚。

项英一再抵制中共中央、毛泽东为新四军制定的正确方针，这就为蒋介石制造皖南血案提供了军事条件。

屡拒叶挺真知灼见 一误再误，将全军推向灭顶之灾

项英决定转移时，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但是，如果不一再延误良机，采纳叶挺等人的正确建议，化险为夷并不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有损失，也不至于大到几乎全军覆没的程度。正是由于项英在决定转移和行军指挥过程中，一意孤行，犯下了一系列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把近万名新四军将士一步一步地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一拖再拖，痛失主动。兵贵神速，此乃兵家常识。当时，新四军四面受敌，战争一触即发。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还未下手，并非心慈手软，而是距蒋介石规定新四军撤离截止期（1940年12月31日）尚差5天。如果抓住这一时机，紧急动员，星夜兼程，使国民党军队措手不及，尚可死里逃生。然而，项英居然不慌不忙，12月26日接到中央电令后，28日才开军务会正式研究，白白浪费了性命攸关的两天时间。这时距31日还有3天，若迅速转移，还有主动权。遗憾的是，项英决而不行，一直拖到蒋介石规定的截止日期，他仍然在云岭逗留。宝贵的5天时间就这样眼睁睁地被他虚掷了。1941年元旦一过，国民党立即举起了屠刀，蒋介石给“皖南围剿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发来密令：一举将皖南共军一网打尽！但敌人摸不清我军具体动向，一时未敢立即发难。直到4日下午，项英才终于姗姗出动。此时天公偏不作美，下起了滂沱大雨；敌人也从容不迫地摸清了我军意图，并迅速调整了攻击部署，只等我军上钩了。

独断专行，自投罗网。新四军转移时，摆在面前的北移路线有三条：一条是径直北渡，就近从皖南铜陵与繁昌之间渡江北上；一条是东进苏南，再行北渡；一条是经茂林山区南下，然后东进苏南，再北渡长江。三条路中，北路，我军已派一个营在铜繁之间准备了渡船200条，渡口12个，还设置了许多兵站，

对渡江作了周密详尽的准备；东路，是皖南、苏南新四军主力常来常往的要道，地形平坦；南路是顾祝同为项英指定的，路况不明。但北路东路日伪经常出没。1940年12月28日，军分会讨论时，项英提出走南路，军长叶挺以此路弊端重重、路况恶劣不便大军行进，特别是国民党尽是些口蜜腹剑之徒，一旦中计遇伏，定将全军覆灭为由，坚决反对。项英在参谋处长赵凌波（后叛变）竭力支持下，以顾祝同拿人格担保，料定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借口，执意要走南路。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项英争辩不过，便不顾叶挺的坚决反对强行通过。会后当晚，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闻讯，立即向副参谋长周子昆反映，说走南路太危险，应慎重考虑，且来不及准备。项英听说后勃然大怒：“不走，说我没有主张，要走，你又说准备不及，你们怎么搞的？”^⑨并命人将叶挺批准的从北路渡江的周密计划付之一炬。12月30日，中央电示项英，说皖南新四军“分批走苏南为好”。元旦之夜，项英回电中央，说已经决定北移，而对怎么走缄默不语，使中央失去了帮助他纠正错误的机会。

一意孤行，自绝生路。1941年1月7日，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山区被预伏的国民党军队合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险境，叶挺的话不幸而言中。下午2时，军部在石井坑一间茅屋急商对策。北伐名将、英勇善战的军长叶挺明确指出，攻下星潭乃全军唯一生路，力主不惜一切代价，打通前面的出口；项英以星潭万一拿不下来怎么办为由，力主后撤。为了保全全军将士的性命，叶挺与项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唇枪舌剑争执达7个多小时。此时四处枪声大作，夜色深深，会议仍无结果。叶挺被迫主动停止争执，忍痛退出会场。项英一锤定音，全军后撤，寻机突围。叶挺闻之，仰天长叹，泪流满襟。结果一声令下，已被我军前锋部队攻克的星潭村突破口又拱手让给了敌人，全军将士丧失了最后的一线生机。

临危逃脱，自毁长城。项英下令回撤后，我军再次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8日白天四处碰壁，好不容易来到了离茂林镇不远的高坦村。晚上8时和10时，军部电台两次捕捉到敌人将于次日上午向我军发动总攻的电波。项英见报，惊慌失措，置近万名新四军指战员于不顾，擅自带领几个人，趁着浓浓夜色悄然离去。叶挺得知，怒不可遏：“想不到平时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经过他的项英，现在竟置新四军广大官兵的生命于不顾，跑掉了！”^⑩叶挺没有意气用事，他忍辱负重，独撑危局。虽然后来中央也曾电令新四军由叶挺全权指挥，失败已成定

局，纵使叶挺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回天了。敌人以10倍于我的兵力发动了疯狂进攻，广大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14日宣告惨败。

皖南事变中，我军损失之大令人震惊：军长叶挺在西坑山下谈判中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负伤后在青戈江畔自杀，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中被叛徒杀害。4000名新四军官兵葬身在茂林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4000多将士不幸被俘，许多人后来也被折磨至死。数百人失踪。最终突围出来又回到革命队伍中的新四军指战员仅700人左右。一支近万人的抗日劲旅，在一周之内，就这样被项英深信不疑的“友军”无情消灭。真乃千古奇冤，奇耻大辱！

岁月倏忽，时光流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虽然随着历史的长河中流逝了，但是，由千万革命先烈殷殷热血写就的沉甸甸的惨痛教训，仍然在重重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注释：

①1938年王明在武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②③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395、755、7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新四军在安徽》第8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⑥⑭叶钦和著《回忆叶挺军长》第43、43、55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⑦《星火燎原》之五，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⑧⑬《大江南北》1988年第5期第30、34页。

⑨⑪⑫《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9、68、120页。

本刊被推荐参加全国首届 优秀社科期刊评奖

本刊讯 今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在学术理论类、时事政治类、综合文化类和教学辅导类等四大类期刊中，评选首届优秀社科期刊。将评出优秀社科期刊20个，提名奖20个。

这次社科期刊综合性评奖，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评选条件极为严格。每个省市自治区，只能在四大类期刊中各推荐一家参评。据悉，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在组织专家严格评审的基础上，经局党组研究确定，在我省时事政治类刊物中，推荐本刊参评，并已将材料上报评选办公室。